

有多少保障性住房还是“空中楼阁”？

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省市区人民政府和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增加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的投资收购和开发建设;促进中小户型、中低价位普通商品房开发建设稳定发展(《人民日报》11月11日)。

之所以说是“再次强调”,是因为在此前的多次中央会议上及楼市政策里,“保障性住房建设”被屡屡提起,并作为应对当前经济困难、扩大有效需求的重要手段。去年,国务院就曾专门发出《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对保障性住房作了严格的规定。现在很快要到底了,有必要对照中央要求,查一查有多少保障性住房还是“空中楼阁”。

国务院在去年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在去年年底前,所有设区的城市都要对符合规定住房困难条件、申请廉租房租赁补贴的城市低收入家庭基本做到应保尽保;在今年年底前,所有县城也要基本做

到应保尽保。这两个“应保尽保”,基本覆盖了包括县城在内的城市所有低收入家庭,他们的住房问题在今年底之前,都必须有个明确的交代和答案,或迁居廉租房,或领取住房租赁补贴,或以较低价格购买经济适用房。为城市困难群体提供保

用之后全部用于廉租住房建设;三是土地出让净收益用于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比例不得低于10%;四是廉租住房租金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项用于廉租住房的维护和管理。有钱好办事,从理论上来说各地保障性住房都不应该存在任何

国务院的两个“应保尽保”,基本覆盖了包括县城在内的城市所有低收入家庭,他们的住房问题在今年底之前,都必须有个明确的交代和答案。

障性住房,对政府而言,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刚性的规定。

只要严格执行中央的要求,落实这方面的政策并没有多大障碍。中央对解决保障性住房的资金来源,给出了通畅的途径:一是地方财政将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纳入年度预算安排;二是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在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和管理费

欠账。问题是钱是否舍得花。不少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兴建保障性住房的积极性并不高,他们深知这样的“国外经验”:廉租房供应量每增加5%,将迫使房价下跌3%~4%,很多官员显然不大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但住房问题,从来都不局限在经济学范畴。住房除了具有商品的一般

属性以外,还是一种社会基本保障品。中央三番五次强调,各级政府要把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作为维护群众利益的重要工作和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令人遗憾的是,在今年初各地人代会上,一些政府工作报告里有保障性住房的表述。

不过,北京市今年的表现值得一提。今年该市已供限价房用地462万平方米,其中经济适用房300万平方米,比2007年多100万平方米。预计年底前北京市将提供超过7万套房源。遗憾的是,北京的做法即使不是一枝独秀,也是凤毛麟角。

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对于拉动钢铁、建材及家电家居等产业发展举足轻重,对金融业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在消费不旺、出口下降等严峻形势下,加大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好办法。各地应按照中央要求,大力兴建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双限房。如此,既能拉动内需,又能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

祝您赶紧“脱光”

昨天是民间版的光棍节,月份和日期连在一起刚好是四个“1”,像竖着的四条光棍。在此,我对光棍们致以迟到的祝福。那些男女光棍们,一个个耐不住寂寞,在这个日子里玩起五花八门的节目来,要不就抢亲,要不就“脱光”(即结婚结束单身生活)。

“广州300多新人光棍节结婚,各大酒楼爆棚”(《信息时报》11月11日)的新闻就是明证。但光棍节这一新民俗的流行也折射出一些社会问题。“光棍节”新民俗得以流行,前提是有大量男女未婚,特别是适龄人口未婚,首要原因是男女比例失衡。按理说男多女少,男的找老婆较难,但一些调查却表明,在城市里女白领结婚难已经成为广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有人认为,女童入学年龄推迟,学制延长的教育改革,在相当程度上造就和恶化了我国城市大龄知识女性的求偶危机。比如一个女孩,7岁入学,本科毕业,23岁,再读硕士毕业,25岁,之后工作3年站稳脚跟就到了28岁,错过了女性最佳婚龄。广东省妇联一项统计或许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珠三角单身白领超过150万,过四成集中在广州”(《新快报》11月11日),而且女性居多。再例如,“汕头25岁女大学生嫁给补鞋郎,住进简陋出租屋”(《广州日报》11月11日)。

“广东省副省长肖志恒称广东企业未出现倒闭潮,今年起三年内每年投入1.8亿支持中小企业”(《信息时报》11月11日),他谈到金融危机下的广东企业形势时说,广东的企业还没有到“掀起倒闭潮”的程度,前三季度广东关闭企业5万多家,但新注册的企业却超过9万多家。这条新闻透出的积极信号,给人的感觉是鼓劲加油。可以说,提高人们对未来经济增长信心的预期,是及时雨,而每年投入1.8亿元支持中小企业的,则是定心丸。

提到所谓的“倒闭潮”,有一条新闻倒是值得关注:“梁山泊”万言书指点东莞企业“过冬”,引来20万人次阅读”(《南方都市报》11月11日),这位网名叫梁山泊的人据说是一企业老总。留意他应对金融风暴的六条计策,在下以为可谓“太有才”了,丝丝入扣,一针见血。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孟子又曰:“心之官则思。”有关部门应当对这种民间智慧给予必要的重视和集纳。

“广州公积金贷款个人将提至50万元”(《信息时报》11月11日),在我看来,市政府之所以出台这样的新政,显然是想满足住房需求,解决底层人群的住房难,从而达到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目的。只是需要提醒的是,公积金贷款额度提高,房价也应该适度下调,而不是相反。因为只有开发商和消费者形成某种互动,再加上政府的适当引导,才有可能一扫楼市周期性低迷的“宿命”,促进楼市转入理性发展的轨道。

解答城市包容性不能如此草率

说到地方情结和与此密切相关的排外情绪,我想任何地方或多或少地有一些。笔者作为一个几十年来流徙于不同城市的资派异乡人,亲身感受到广州这座城市的包容性似乎更强一些,也更开放一些,这一点亦为民间的口碑所印证。但这么说,并不必然表明广州在这方面与其他城市有本质的差别。即使有的话,也应该通过缜密的研究来加以证明。

但有意思的是,有位学者一句话就道出了不同城市的区别。据《信息时报》昨日报道,日前在中山大学的一个学术讲座上,有人向该校李宗桂教授提出了一个很轻率的问题:“为什么广州文化那么包容?上海文化那么排外?”李教授居然对这一问题毫无质疑,欣然作答。对于一个不怎么靠谱的命题一本正经地回答,答案也自然不会太靠谱。李教授的答

案是:“这与历史有关,从历史上看岭南自古是流放之地,很早就和北方人士接触,因此比较容易接受外来文化”。

听起来好像有些道理,但经不起推敲。中国历史上作为流放之地的地方有很多,东南西北都有,这些地方的共同特点是与中心地区在地理上、文化上都有比较大的距离。但这些流放之地是否后来都形成了相对较为开放的文化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李宗桂教授的说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将其作为主要的原因而提出,恐怕难以令人信服。

笔者本人一点也不比李宗桂教授高明,对于“为什么广州文化那么包容?上海文化那么排外?”诸如此类的问题没有能力给出结论,对于回答“广州文化为什么具有开放性”这样的问题颇觉棘手。但作为接受过一定学术训练的研

究人员,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想我应当先去进行研究。首先当然是确定这些问题有没有研究的价值,假定有研究价值的话,就要进行资料的搜集、定性定量的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我想,结论肯定远远不止“岭南自古是流放之地”这样简单。

我的意思并不是要求李宗桂教授对每一个听众提出的问题都要进行研究,而是说作为一个学者,在一个郑重的、公开的学术讲坛上,对每一个问题都应该谨慎,任何一个结论都应该有自己的或别人的研究成果作为依据。如果对有关问题自己没有研究,对别人的研究成果又不太了解,不妨如实向听众讲明。坦坦荡荡,这样的作风和学风反而更容易博得听众的理解和尊重。如果仅凭一时的机智,硬要得出一个答案,则很有可能误导大众。

一语惊人

马尔代夫欲举国搬迁

“两国国情不一样,直接能够去学的东西不是特别多”

——中国9名官员观摩美国大选,称中国选民素质有待加强。

出处:《国际先驱导报》

“明仁天皇应以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为榜样”

——韩国总统李明博称日本天皇应为日本侵略亚洲道歉。

出处:《环球时报》

“无法阻止全球变暖,只能到别处购买土地”

——冰川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马尔代夫总统称要举国搬迁。

出处:《重庆晚报》

“今天我们不需要异性”

——湖北一KTV派发光棍节传单,称拒绝情侣入内。

出处:《长江商报》

“政府不救市你可能就买不到房”

——西安市房管局官员称该市救市做法有示范意义,不少城市来取经。

出处:《西安晚报》

“警察有什么了不起,有本事将我打死”

——成都肉贩不满被罚款10元,持杀猪刀砍伤2名城管3名警察。

出处:《成都商报》

“有人把国旗当被子用”

——网友爆料称武汉市郊某检察院门口有人晾晒国旗被褥。

出处:《现代快报》

木桦辑

“知情人士”何以越来越像发言人

温州官员杨湘洪出国考察滞留不归事件有新进展。11月7日,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浙江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开除杨湘洪公职以及党籍(《21世纪经济报道》11月11日)。

杨湘洪事件沸沸扬扬至今,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官方消息。即便是此番“开除公职和党籍”的透露,也是根据“知情人士”的披露。尽管未经证实,但对这一消息的可信度,我认为还是颇高的,因为杨湘洪被如此处理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总不能让一个滞留国外拒不归国的“嫌疑人”还担任着党和政府的高级职务吧?我所关注的是,官方的态度何以迟迟不肯明朗?

关于“知情人士”,我们都不陌生。这一看上去很是怪异的身份,频频出现在各种新闻报道中。

“知情人士”究竟是一些什么人呢,何以消息如此灵通?答案并不复杂,所谓的“知情人士”大多是相关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和各行各业的“业内人士”,他们的消息来源多是自己的亲身见闻。知情人士的“透露”,与流言蜚语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具有较高的真实性。但“知情者”毕竟是个体,只有官方发布的信息,才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

然而现实却是,“知情人士”太多了,在很多时候居然像极了党政机关的发言人角色。但尽管这一群体异常活跃,于社会庞大的信息需求而言,也是杯水车薪。甚至有时候,还可能引起舆论的不安和疑虑。于是乎,另外一种民间化的信息传播方式就不断粉墨登场,是为“流言”甚至“谣言”。权威信息千呼万唤不出来,小道消

息必然风行。远的不说,单就杨湘洪事件,网上及坊间各种版本的猜疑就层出不穷,“传言”满天飞,到现在还没有平息。

稍加留意我们便不难发现,“知情人士”透露的各种信息并不是商业机密或者国家秘密,全部都是公众迫切想要知道的各种信息。既然不是“秘密”,有关部门为什么不能及时公开?为何不让官方表态走在流言或“知情人士”的前头呢?就拿开除杨湘洪党籍和公职来说,公之于众会有什么障碍吗?

在当今信息时代,公众对知情权的要求越来越高。“知情人士”的小道消息以及流言蜚语的广阔市场,说明公众对信息的需求是多么的强烈。只要信息公开透明并成为有效的制度安排,“知情人士”和流言必然会退出社会视野,最终失去市场空间。

